

底层社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卢 岚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 430070]

□卢 萧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 230000]

[摘 要] 社会稳定需要一个稳定的底盘作依托,底盘稳则社会稳,而底层(草根阶层)这个独特的群体就是社会的底盘,然而它又有其先天性的缺陷,影响自身的发展。因此要保证底盘稳固健康的发展就必须把社会底盘作为社会建设的重心。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深入到社会底层对草根阶层进行全方位的风险识别,剖析它的风险属性,把握客观困境,直面社会现实,开展理念再造。把底层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来抓,以提高草根阶层的思想道德素质,促使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关键词] 底层社会; 草根; 主阵地;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1)03-0102-06

当前,“在经济建设成就之大超乎人们预想的同时,社会问题之多也出乎人的预料”^[1]。利益格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的深刻变化,推动着中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使“中国社会呈现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双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共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包含痛苦相伴”^[2]。这种双重性与复杂性导致社会矛盾大量突显,其根源在于中国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对资源与机会的垄断,导致社会底层扩大,并使社会底层处于财富、教育、权力等多种劣势的重合压力,面临多重困境。这既是个体的残酷,更是社会的绝情。短板原理给我们的启示是劣势决定优势,处于底层的草根阶层就是最短的木板。短板不补起,长板再加高,这个社会也不会是个健康稳定的正常社会。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开始好转,社会矛盾初现时,底层民众已开始“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就骂娘”。而如今是话不过三句就骂娘。这充分证明资源与机会分配不均给社会带来的问题之大。也就是说,底层——草根的沦陷将会导致和加速整个社会的沦陷,更谈不上构建和谐和谐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强调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这就意味着作为“生命线”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触及现实社会,以每个人的生存和终身幸福为根本目的,始终保持理论阐述和社会解释的权威性与有效性,给群众一个明白交待,并借助现代信息载体对人们进行心理抚慰、疏导与改造,包容人,理解人,为保障民众的利益诉求疏通管道,提供平台。思想政治教育要把底层群众思想上,心理上的改造作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根本性工作来做。因为社会价值观重组的要求以及方向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人们思想与心理发展预期,决定着价值观的影响程度。如何使主流价值观的高度政治性与基层社会成员的生活性、世俗性的心理发展预期无缝对接?其关键在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的整合上。所以说,占绝大多数的底层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一、底层社会及其风险

“现代性过程必然滋生着动乱”^[3]。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深水区——风险社会。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将不会止步于财富分配的公平,而将关注到风险分配的公平,即尊重人人平等的生命权。而今天120万人的家当托起一个富豪,贫富差距如此之大,足以说明中国草根阶层为改革付出的代价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力。无论是

[收稿日期] 2010-11-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10YJA710040)

[作者简介] 卢岚(1967-)女,法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卢萧(1971-)女,硕士,上海理工大学宣传部。

在限速的闹市区的斑马线上,富家子弟驾车碾过行人躯体时溅起并喷般殷红鲜血后的谈笑自如与“我爸是李刚”,还是体现出的社会不公及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结构性怨恨和相对的剥夺感,皆反映了民怨集中的大规模排解。如此这般,是底层社会对立的气氛陡增,是个人生命自由和公权力的对抗,是由于缺乏公平正义导致的资源匮乏,乃至尊严的丧失。如果说,前一轮改革主要解决的是人需要的较低层次的问题,即物质的富足,那么下一步的目标则直指更高层次的需要,用温家宝的话讲就是直指公平正义。因此,在和谐社会建构中,底层社会的生活状况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工作。

(一) 底层社会的涵义及其构成

“底层社会是基于社会结构研究范式揭示社会秩序的一个概念,意指那些生活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最下层的群体,他们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不断面临生存生态恶化所带来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4]。

当今的底层公众群体较之传统意义上的底层来说,其构成更加复杂、文化程度相对有所提高、价值取向多元、自我期望值高、利益诉求表达欲强烈。典型群体有农民工二代、大学生蚁族等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与工人。当前,“底层社会”呈现扩大化趋势,原因很多,最易被观察到的就是因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而导致社会底层的扩大,而且阶层之间的屏障日渐固化。一方面,弱者和底层向上的努力日益艰难化,即使努力也无法改变人生轨迹的残酷。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乃至处于悬殊状态,造成了发展能力的缺失。另一方面,在代际再生产的问题上,对于底层而言,父辈的差距正被复制到后代身上。最后是底层对于冲突的解决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因为拆迁、下岗、失业等感到利益受损的人,一般通过群体性事件来争取权利。而当今却以自杀、报复社会等个体的、逃避似的反抗形式出现。从表面上看,目前群众上访的比例减少了,但这不是社会问题和民怨的减少,而是官官相护告状无门的结果,是对政府失去信任后的无奈,是我们感觉到的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这更加提醒我们,对底层社会的困难处境应有清醒的认识,尽可能全面了解底层社会的思想动态,帮助底层社会群体摆脱困难。

(二) 社会结构现状及其社会矛盾的生长

1. 中国社会现状

我国改革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经济发展,使“我国

正在形成一种‘断裂’的社会,底层民众被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是2.36倍,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缩至1.72倍,2002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1倍,2002年中国最富的上海与最穷的贵州之间的收入差距是12.9倍。中国的地区差距甚至大于印度(4.5倍)^[6]。从1992年到1998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37.6增至40.3,其中最低居民收入和最高的20%居民收入份额分别从6.2%和43.9%变为5.9%和46.6%;至1998年,最低居民收入和最高的10%居民收入为2.4%和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说,最高达158.1万元,相当于户均财产22.8万元的近7倍^[7]。社会不稳定状态的矛盾凸显,群体事件呈增长趋势(从1993年至2003年,群体事件从1万增至6万,参加人数由73万增至307万,2007年群体事件数量超过8万^[8])。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不合理的亚健康的“哑铃型阶层结构”,即精英阶层社会地位高,所占社会财富比例大,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农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等社会底层规模过大,于是出现了该大的没大起来,该小的没小下去的社会阶层现状^[9]。2007年11月,广东商学院课题组在国内首次提出“特权阶层、特殊利益集团”的命题^[10]。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博弈将成为常态。一方面,拥有少量社会资本的草根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越来越被边缘化,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另一方面,社会建设的滞后性和政府职能的不完善,特别是垄断资源,成为市场利益主体,不仅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增加,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政府往往站在富人一边,形成“富官”一体,使自己成为社会冲突的对象,导致群发事件凸显,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现象,这些现象成为制约和谐发展的瓶颈。而庞大的基层底盘的稳定恰恰决定着社会的稳定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

2. 社会矛盾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在当前的社会矛盾中,官民之间的矛盾居前列。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在全国城市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样本为5894份),社会上当官的与老百姓是第一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高达44.1%;社会上穷人与富人(包括有财产的人和无财产的人)是第二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为20.2%^[11]。这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发展趋势使得社会中的腐败与分配不公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首先官员腐败,这是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伦理冲突。因为,官员腐败并不是对一个人或者

少数人的侵害,而是对国家权力所有者即一切社会成员的侵害,进而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大大地破坏了国家与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官民关系紧张。民心渐散,群众开始对干部道德产生怀疑、批评和缺乏信心已经是包括公务员群体在内的“道德共识”。更严重的是,公务员群体不仅在道德行为方面,而且在职业动机方面也陷入深刻的信任、信心、信念危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法律的滞后和民间草根组织的缺失;另一方面是民众与政府关系的行为错位使得政府对民众负担了几乎难以承担的无限责任,这自然会导致公权越轨而直接损害民众的合理利益。近些年来,党和政府虽然在惩治腐败方面采取了果断而又严厉的措施,但是由于信任和信心危机的存在,公务员群体仍处于伦理合法性与道德合法性的危机之中:伦理道德方面最不被信任的群体之首就是这种危机与冲突的表现^[12]。

3. 公导致的群众的个案向整体化演进的趋势

我们在推进经济建设、发展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忽略公平正义,社会建设滞后等现象。在改善民生问题上,说得多,做得少,致使基本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使得底层社会成员积怨甚多。于是,一旦发生矛盾就呈现出连锁反应,使个案问题演化成整体化矛盾,使矛盾扩大化。尽管在利益无涉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都属于“打酱油”一族。但是如果谎言过于离谱有辱人的智商,就必定遭遇民意的反弹。我们可以看看每次群体事件中产生的“流行语”、“关键词”:从瓮安事件中我们知道了“俯卧撑”;云南晋宁事件中我们知道了“躲猫猫”;上海在建楼房倒塌事件中我们知道了“压力差”。这简直就是调侃政府,拿上述的愚蠢理由开涮,哪里还有尊严、信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直接利益相关者介入群体事件?为什么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行动激烈,逢官必反?其实这是对利益失衡的不满表现,尤其是对不受制约的权力的痛恨^[13]。因为“在两个权力个体之间的对抗中,围观者会自动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利益进行分化、站队”^[14]。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阶层利益关系,化解矛盾,扩大社会的基本安抚,使得人们即使在竞争中落伍,也能够得到起码的、体面尚存的最低保障。尽可能减少绝望、减少孤立无援的人情冷漠,从而减少孤注一掷与社会同归于尽的恶性事件发生。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肩负的任务。

4. 社会的焦虑风险

随着风险社会的出现,人的价值观的裂解,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15]。人们

逃避选择,精神空虚,出现信仰危机和道德风险的窘境。“正是这一系列风险给现代性以一种失控的毁灭力量的感觉,并使我们内心充满了本体的不安全感”^[16]。焦虑、彷徨、迷失的心理积淀使人们在这个特定的由农业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期中感到无所适从。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仇富、仇官心理等社会焦虑成为当前明显的时代特征。当社会成员具有了某种社会焦虑和被剥夺感时,就往往容易加重原本并不严重的矛盾心理和不满情绪,进而演变为迁怒其他人或社会的极端现象,轻易主动卷入某些自己本来或许没有料想到的纠纷之中,成为直接参与者,因为这些社会矛盾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回顾郴州、重庆、绍兴等地的大小官员窝案到贵州瓮安事件,云南胶农冲突事件乃至上海杨佳袭警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突发社会矛盾的经过,现在冷静的检讨一下,当时哪些能避免,那些能缓和,冲突的根源究竟在哪呢?是刁民蓄意闹事,还是百姓维权无门?还是地方政府处理不当?很明显腐败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许多群发事件的发生都源自官员的腐败行为和不实事求是的行政行为造成的。基层干部及党委和政府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普遍存在“暮然心态”,“看热闹心态”,“鸵鸟心态”等干部责任流失的问题。网络对政府信息的质疑甚至恶搞“被”句式的流行,例如政府民意调查中的“被满意”“被小康”“被就业”等,虽有偏颇,但反映了民意对政府行为之公正合法性的质疑。社会信任的失调乃至畸变给日常生活和社会管理带来极坏负担和成本,最常见的就是对各种产品质量不信任。底层社会潜在的结构性压力和对立、排斥力量正在增长,而且极易被激活。其实,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不必然与困苦的程度成正比,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以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17]。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位加剧了底层社会的道德风险

“分层的社会结构生来就不稳定”^[18],如果人们认为其所在社区收入水平差距被拉大的程度越大,则其所感知到的阶层之间的冲突就越强烈,如果人们认为‘权利造成的不公平程度越大’,则人们所感知的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就越显著^[19]。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阶层理应互惠互利,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增进应当保持一种同步化的状

态。而当下,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出现了弱势化的趋向,下滑为底层社会,成原子化状态,同时精英群体却出现了利益结盟的苗头。而且这种较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根源。欺贫与仇富蔓延,当前又缺乏合适的思想政治教育去教化受伤的弱势阶层,于是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人们心中有“仇恨”却不知向谁发泄,一旦出现机会,这“仇恨”就很可能随时随地爆发。于是乎,就常常挺而走险,以暴力报复社会。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位加剧了底层社会潜在的道德风险。

(一) 资源的匮乏使民众道德存在潜在风险。

由于崇高道德理想的缺失和个人利益诉求的高扬,无形中人们就把经济发展结果作为终极目标。民众期待的就只能是经济与发展,自己的利益欲求是否满足,一旦人们对这个结果表示异议与不满时,怀疑与怨恨就层出不穷,且自然会寻找机会以泄愤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改革开放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入世以来受全球化经济、文化的冲击影响,使得国内各阶层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日趋激化,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草根阶层。他们在被骗而无法讨回公道的时候,为了生存也只有加入骗的行列。农民工讨工资,这在全国无人不知,由此引发的纠纷而造成的群体事件已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但其解决的结果,吃亏的还是草根。欠债者最多是先付一部分或分期付完,或政府帮助垫付,乃至出现总理为民工讨薪的窘境。而欠薪者不但没有因不讲诚信而受到信誉上的损失和处罚,连滞纳金也从未赔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因偏袒、软弱而失信于民,结果使得本来就很脆弱的诚信道德坍塌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南京彭宇,只因他热心帮助一个不知何故歪倒并骨折的老太太,却因好心救人结果反被恩将仇报。在找不到肇事者来承担巨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老太太及其家人便一口咬定彭宇为责任人,并试图让这位好心人承担一切责任;再有扶起孕妇反被诬撞人;拾金不昧却被告上法庭……。近来“挑战道德底线”事件频频撩拨着公众的神经,使得人们陷入路有不平,乏人相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窘境。于是,人们会更少伸出援助弱者之手,而弱者的未来也就可能处于更无助的状态。因为资源的匮乏,生存空间的逐步缩小,社会维护穷人尊严的空间越来越小,导致了草根阶层思想道德的沦陷趋势,以致在南京出现不敢拾金不昧,乃至失物有偿招领的怪事。

当生命直接与金钱画等号时,生命就没有被尊

重的可能。当权贵占尽所有的优质资源,却还要拼命挤占底层者那匮乏的资源时,当底层生存空间已被挤压到只有靠出卖生命才能换回些银两时,草根阶层也就会拿生命、道德良知来对抗资本和权力,去触摸黑暗。因此,不论社会、经济发展所凭借的社会制度与工具手段如何多元、多样,但其有着一个同一永恒的道德目标诉求,即民生问题。特别是广大草根阶层的生活、生存等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民生问题是国家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头等大事。“一旦失去了平等自由、正义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造成一人内在自我的不发展,而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内在自我不发展的个人,当然只能是一个缺乏自我、麻木僵化处于伪生存状态的人”^[20]。

(二) 国家权力在底层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位。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万能的,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以仁义、道德、良心、良知等形式出现的中国理想,实质上是要以国家权力的介入才能真正付诸行动实践的。国家权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机构组织,专职队伍渗透到群众中,把道德、良知、良心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因为尽管底层社会群体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思想,而一旦底层民众接纳思想政治教育者灌输的核心价值观时,也就会被引入权力秩序。因此,当今社会不是崇高理想的有无问题,而是崇高理想如何得以进入基层社会,安定底层民心的问题。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转变就在于直面底层社会,直面生命,关注对每个社会成员,“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视为引导主体进行价值追求、价值创造,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以满足和发展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1]。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它要解决一个人要做什么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人的一生如何渡过的本体论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个无形的“智慧之手”的空场,而使底层民众无法在对自身世界和历史中的价值意义的追寻中构成人性的终极关怀,难从人生终极意义上给予现实生活以关照,乃至无法延展自己生命活力的价值、意义、目标与归宿。在遭到不公时,常常采取极端的反抗释放对现实的不满。因此,必须把底层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在底层社会配置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一步一个脚印地做起。毕竟自发的意识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人的安生立命的终极价值只能靠思想政治教育从外面灌输给底层民众。

三、底层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日本许多学者研究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

追问: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抗战中打败日本,接着打败蒋介石,又在朝鲜战场中打败美国,为什么小米加步枪能够打败飞机大炮呢?他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一股精神。这种精神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日本人认为,中国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运用于战争,取得胜利,就可将其运用于经济领域,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取胜^[22]。其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以思想解放为主要动力,美国管理学家爱默森在《效率十二条原则》一书中写道:“当代财富不是由劳动资本或土地创造出来的或正在创造的,而是由思想创造的,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思想”^[22]。中国的现实社会也迫切需要我们思想解放。因为“变革产生了日益提高的期望,而变革的必然有限结果,却不能使这些期望得到满足。一旦人们认识到事情可以变化,他们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轻易地把他们现实条件的基本状态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23]。“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2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实践活动在思想领域的投射,因此其本应引领社会方向,提供理论依据,形成核心价值观的,拓宽其覆盖面,视角下移,关注草根命运,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关注民生,发展民生,把底层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来抓,这是因为:

第一,从民众的素质与政府的执政水平关系的维度上看,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政府不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存在物,而是内生于社会。政府的性质取决于它所内生的社会,也决定了政府行为的社会效能。民众的道德水准,决定了政府是否腐败及腐败能否得到打击和制约。草根阶层是产生政府官员的源泉,基础好了,苗自然就好。因此,政府的腐败失信,也有民众容忍的一面。如果一个社会孕育出一个腐败、失信的政治体系,那么这个社会本身的道德水准一定是低劣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主阵地在草根阶层。好而先进的制度是不可能建立于一个民众文化落后的民族的。

第二,从历史维度上看,单单依靠精英提升整个社会从来就没有成为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也是如此。对“一个从眼前事实出发的人来说,他的存在都依赖于大众,因此大众的思想必然控制他的行为,他的爱好和他的责任”^[25]。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其主阵地自然就在“草根”。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政府的行为应处在公众视野之内,接受基层监督。政府应俯下身来,直面各种各样的矛盾,政府唯有将改善

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收入、保障等作为全社会的头等大事,才能取信于百姓,才能形成一种虽然可能比较辛苦,却依然能够感受尊严、有希望的社会生态。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搭建平台,形成信息聚集地和精神共同体,让沉默的大多数真正开口说话。让大众从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传播者,让民众由文化消费变为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让底层民众从思想道德文化的原料提供者变成文化的生产者,真正充当精神文化的主角。政府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平台了解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的冷暖、意愿与呼声,为他们解疑释惑。

第三,从公平正义维度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应在“草根”。民生问题并不等于丰衣足食,它涉及到人的全面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涵盖生活的全部内容,在物质化的生活之上,人们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滋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基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感染、召唤普通民众,以质朴的人文关怀打动民众,以敏锐的触角捕捉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反映普通百姓的疾苦与呼声,引导“草根”阶层形成一种具有和谐意识的思想观念、理想信念、社会风尚、价值取向,提升其价值观和精神境界。因此我们要下狠功夫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体现“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推进基层民主,真正体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意义。要从责任伦理的角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市场公平、社会公正、权利与义务一致,守法诚信等责任伦理思想的整体去对公民进行教育,使百姓品味生活,过踏实的日子。要通过扩大草根参与政治的通道,使民众参与监督,提高草根阶层的参政意识。如汪洋所说,媒体应在两会上发现“苏珊大妈”。这在今日中国,虽说“尝一脔之调”,未能知“一镬之味”,但因为这“一脔之调”的改善,仍可能为“一镬”带来更好的味道。还是那句老话,“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才会安全。”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革命的传家宝,既然是传家宝就万万丢不得。当前社会矛盾多样、复杂尖锐与思想政治教育名存实亡也有一定的联系。既然改革开放是中国革命的继续,传家宝也就应在新时期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现实实践,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回顾、梳理、探索、研究,找到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形式、理论,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其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如何从人的视角来诠释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人的意义以及人类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如何探索、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与生命世界之间的对话与交

往的过程,使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底层社会中去,继续发挥其传家宝的作用是本文的期盼。

参考文献

- [1]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5.
- [2] 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J].社会科学研究,2008,(4):1-9.
- [3]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43.
- [4] 潘泽泉.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J].社会科学,2010,(5):74-79.
- [5] 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7.
- [6] 赵凌云,张连辉.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J].中国当代史研究,2005(1):24-32.
- [7] 龚平.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J].中国财政,2008,(8):12-14.
- [8] 邵道生.正确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N].社会科学报,2009-03-04(1).
- [9] 梁雪松.腐败的治理与法制兴国的制度重构[J].学术界,2009,(3):266-275.
- [10] 石磊.中国弱势群体排行榜[J].南都周刊,2007,(172):1-2.
- [11]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3.
- [12] 樊浩.当前我国民族社会群体伦理道德的价值共识与文化冲突[J].哲学研究,2010,(1):3-12.
- [13] 郭于华.信息的黑洞[J].社会科学家茶座,2009,(4):86-90.
- [14] 益雄.无直接利益冲突[J].百姓,2006(12):24-25.
- [15]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4.
- [16] 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04.
- [17] 埃里克·霍里.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4:14.
- [18] 西摩·马丁·李普赛特.一致与冲突[M].张华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2.
- [19] 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0.
- [20]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4.
- [21]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8.
- [22] 苟永才.思想教育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
- [23] 迈克尔·克罗齐.民主的危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86.
- [24] 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
- [25] TASPEN K. Man in Modern age, Trans[M]. Eden and Gedar: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1:43.

Bottom Society: the Main Posit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U L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LU Xia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30000 China)

Abstract Social stability relies on a stable chassis, which means the society stable. The bottom (grass-roots) of this unique group is the chassis of the bottom, but it has its inherent flaws affecting its own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grass-root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center of a social construction to ensure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hassis.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entering the bottom of the grass roots to study risk identification, analyze its properties, grasp the objective difficulties, and face the reality of the society to carry out concept of recycl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mainly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of the grass-roots, thus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the entire nation.

Key words the bottom society; grass-roots; main fro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编辑 戴鲜宁